

少年期孩子身上发生了什么变化

“仿佛有人给男孩子注入了新的心灵……”

少年……母亲和教师们在说这个词的时候，是多么惊恐不安！多少部书里写了少年隐秘的心灵！图书馆的书架上放着多少篇研究少年期的论文！

我仔细倾听教师们所表示的忧虑和关切，留心观察从小熟悉的少年。我翻阅了有关少年的书籍。年复一年，我的藏书中共积累了几十个本子和笔记；每个本子都是记述某个小公民生活的别具一格的编年史，从他进校的最初日子起到长大成人——逐年记录了他的成长过程，往往一直记载到这样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一个过去的顽皮孩子、淘气大王，现在把他的儿子或者女儿领到学校里来说：“请收下这个孩子吧，这就是我，样子不同……而实质上大概还是那个我。”

最令人焦虑不安的问题是人在少年期的精神生活问题。对学生集体的生活和工作所进行的多年的观察，使人

们得出结论：在少年期一个人的精神生活发生极其深刻的变化，因而在他的认识能力、脑力劳动、行为、与其他同学的相互关系，在他的情感发展、美感发展、道德成长等方面的许多事实，都使教育工作者感到不可思议。有经验的教育家往往抱怨说：很难对少年们进行工作，他们身上正在产生某种神秘莫测、不可理解的东西。

男孩子在三四年级的时候是再好不过的了，他文静、沉稳、和蔼、敏感，能够领会人在这个年龄所能理解的崇高感情；可是到了五年级，特别是到了六七年级的时候，似乎完全变了一个人，他任性、缺乏自制，时常粗鲁无礼，近乎病态地自尊，对待教师的要求和同学的缺点十分急躁，在评判周围世界，特别是评判长者的行为时尖锐而直率。

有时候，使人明显地感到：在童年期能触动他心灵的那种感情似乎逐渐地根本不能使他动心了。如果说亲人或不熟悉的人的痛苦以前会使儿童心中非常难受，那么一个少年有时竟会对人们的痛苦毫不觉察。

“仿佛有人给男孩子注入了新的心灵，”六年级学生维塔利的班主任在教务会议上说。（可我在边听边想：“难道过两三年之后，维佳或者沃洛佳也会变成这样的人？维塔利在三四年级的时候是个品学兼优的模范生啊！”）“而现在，”班主任继续诉说，“学季结束了……我召开了家长会议，谈了学业成绩。我决定谈一谈维塔利不遵守纪律的问题。我以为，家长们在场会对这个孩子起些作用。我边说边用眼角瞧维塔利。他镇定地坐着，毫无惊恐或懊悔的表情。我突然看到：他打开了我教的这门课的教科书，拿起

铅笔在书的扉页上画什么东西。他的眼睛里闪着幸灾乐祸的表情。他坐在最后一排的课桌后面，谁也看不见他在做什么。我满腔怒火。怎么办？我知道，现在当着家长的面，是不能谈论这个新的出乎正轨的举动的，因为我担心这会惹恼小伙子。我感到他是有意惹我注意他。他故意污损我教的这门课的教科书，是为了激怒我。我把话题转到了别的方面，可脑海里却浮现出几天前我与他——维塔利之间的一场冲突。

举行时事报告会。一个十年级的女共青团员讲述发生在国内外的情况。她讲到了邻近的一个集体农庄的庄员们如何忘我地劳动。妇女们培育甜菜获得了大丰收。荣誉和光荣属于以共产主义态度劳动的人们！维塔利举手说：

‘我想发言。’

‘说吧，’我同意了他的请求。

‘我妈妈坐在泥地上清洗甜菜一个月了，’维塔利激动地说，‘她生病了，现在躺在医院里。为什么把最重的活给了妇女们？’

‘你想过吗，你说出了些什么？’我勃然大怒，甚至没有考虑，这个孩子说出了痛苦的真理。‘你算什么少先队员？’说了这些话之后，我就感到自己使他大大地受委屈了。但是已经晚了……

‘可您算什么教师？’维塔利用颤抖的声音轻轻地说，‘难道一个人可以整整一个月坐在潮湿的泥地上吗？是您教导我们要为真理而斗争。’

“维塔利的这些话使我惊呆了。”班主任在结束自己的叙述时说，“这是什么呢？是蛊惑言论还是追求真理？可能，

我们教给少年们的东西太多了，而向他们提出的要求却太少了？也许，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观察世界的心灵具有某些我们所不了解的特点？也许，少年们观察到的世界的某些方面与我们观察到的不一样？该怎么办才能使现实存在的个别阴暗面不再被无可奈何地接受下来？”

接下来是一通热烈而直率的议论，通过议论得出了一条使我们全体教师都很激动的真理：是的，我们有时候忘记了某些东西；我们往往没有努力用我们的教育对象的眼光去看世界；我们有时会陷入令人惊讶、不可原谅的矛盾之中——教育学生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只说老实话，而同时却又要去扑灭年轻的心灵因对欺骗、恶行和不公正现象的势不两立而迸发出来的怒火。少年不同于儿童，他开始对善与恶进行概括；通过某些事实他看到了一种现象；至于这种现象在他的心灵中会产生什么样的思想和情绪，就取决于他的信念，取决于他对世界的看法和对人们的看法，确实，少年期与童年期的不同之处还在于，人到了这个年龄就不像童年时期那样来观察、感觉、感受事物了。

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少年观察世界与儿童观察世界有什么不同之处？我力图使自己处于自己的学生的地位。我进行教育观察，把它记在单独的本子里。本子里有专门的一个部分《我用少年的眼光观察事物》。我设想自己处于维塔利的地位，用他的眼光来分析、估价自己的行动；我试图使自己也毫不怀疑，我是这样一个人，那个细心、好学、沉稳、要求严格的学生，那个缺乏自制、任性、蛮横无理的少年——仿佛初次遇到的人。

现在，在过了很多年以后，我再翻阅这本不平常的日志

的时候，又重新感受到过去感受过的那种惊讶感。我的那个要求苛刻、蛮横无理、倔强、作出判断时尖锐而直率的少年在我身上发现了大量缺点，竟比我自己想到的多上 100 倍——这是多么令人吃惊和不可理解啊！我情不自禁地要引用资料中的几段记事，这份资料也许会使我的某些教育家同行们发出宽恕的微笑。

1. “我的老师在感知周围世界的现象时，表现得‘心肠冷酷’。他亲眼看到一个男孩子欺负一个女孩子。他平静而冷漠地看着那个欺负人的家伙。他对女孩子说：‘我要跟他谈一谈。明天跟他谈。让他把欺负你的那些话再对我说一遍。’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在老师的意识深处还保留着一个想法，需要跟那个欺负人的家伙谈一谈……但这只不过是一个像昏睡的公猫似的懒惰想法。而那个时候欺负人的家伙却对女孩子说：‘我没事的。老师会把自己学生的行为忘掉的。他们老师们跟我们打交道打腻了……’”

2. “我的老师在一个星期之前把一本他需要读的书放在桌子上。他每次坐到桌旁，总要对书本看上一眼，然后就去别的事情了。而昨天他把这本书放到书架上去了。”

3. “我的老师的心里装着一块冰。他给畜牧人员上完课以后，有一位集体农庄庄员向他讲述了自己的一项发明。这个庄员对于如何减轻劳动强度的问题已经考虑一年多了——在不建造巨大而昂贵的装置的条件下使收集畜粪机械化。老师打算明天到区里去，向

区党委谈一下这项有价值的发明。让工程师到这儿来帮助这个庄员把想法变成并不复杂的机器。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到区里去一趟的热情冷下来了。一个星期之后他偶然碰见了区委书记。确实，他谈到了这位发明家的有意义的想法。但他是怎么谈的呢？他不是充满热情、心情激动地讲这件事，而是轻描淡写、慢条斯理地唠叨：假如这样办的话可并不坏，假如能考虑一下减轻畜牧场人员的劳动强度就很好……”

在记载难对付的少年的观察日志中同样也有一些奇怪的东西。这并不是对他们的行为的记录，而是少年眼里看到的世界。我设想自己处于这些男孩子和女孩子的地位，用他们的眼光看世界。我处处看到令人惊奇的，有时甚至是不可理解的东西，这些东西使人惊讶，往往还令人气愤、怒不可遏。少年能看到儿童未能看到的東西；少年还能看到成人往往已经看不到，确切地说是不再注意的东西，因为成年人对于很多事物习以为常了。少年观察世界是人的一种绝无仅有、异常特殊的状态，我们成年人往往根本不理解这种状态而处之泰然。

少年对看到的東西都非常关切。看见苹果树叶上有一条毛虫，他就思考：为什么校园里（或集体农庄的果园里）有很多毛虫？不消灭害虫会有什么后果？为什么谁也没有注意到毛虫在毁坏物质财富？少年对眼前看到的坏事感到愤慨、对好事感到高兴，还是他对善与恶都无动于衷，这取决于少年在什么环境中受的教育，取决于他在童年期培育他思想和感情的认识、思维和观察世界的源泉是什么。

我对这些尖锐、棘手的教育问题进行了艰苦的思考，终于在我从事教育工作的第 34 个年头得出了一个结论：少年期教育的困难就在于，人们很少教育儿童把自己看做、理解并感觉为集体的一分子、社会的一分子、人民的一分子。这就是为什么经常听到人们说：一个学生在童年期是好学生，可是到了少年期因为受了坏影响而成了坏人。坏影响究竟是怎么回事？它是从哪儿来的？教育工作的基础、它的主要内容，并不在于保护少年们不受坏的影响，而是要使他们对坏的、不道德的东西具有免疫力。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教育的技能和艺术就在这个怎样之中。

……一位低年级的女教师 4 年来对自己的学生们一直赞不绝口。

又过了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她竟含着眼泪诉说自己的学生（他们现在已经是六年级的学生了）：在电影院门口他们差一点把一个老年妇女撞倒在地。

在听这位勤奋的好教师说这段痛心疾首的话的时候，我在想：她的学生过去确实是一些善良、有礼貌、勤奋而又能克制自己的人。这些品质也不是生来就有的。不，这是耐心细致的教育工作带来的结果。那么该怎样解释少年期产生这一年龄段所特有的教育上的困难呢？也许，这不过是用老眼光把少年期看成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灾难的时期，从而出现这种所谓困难的说法？我开始研究 12 ~ 30 岁这个年龄段的人的违法和犯罪行为，起初是在一个区的范围内，后来扩大到一个州。事实总是最公正的。了解的结果是：在 12 ~ 15 岁的人中间，违法和犯罪分子比 15 ~ 18 岁的男女青年中的违法和犯罪分子多一倍。

我研究了 460 例刑事案件的侦讯材料。每一个给社会提供违法分子或犯罪分子的家庭，总是存在着某种缺陷。有时候父母本人似乎并不是坏人，但是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孩子是怎样生活的。很多家庭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方面精神上非常贫乏，而在这些少年学习的学校和班集体里，谁也不去关心他们对什么感兴趣，他们需要些什么，他们把什么当做生活中的乐趣。

我举一个惨痛的事例，这件事发生在一个平静的小城市里。一个 14 岁的少年在滑冰，他看到一个 8 岁的小男孩，就把小男孩叫到身边，朝着有个冰窟窿的方向指了指，对他说：“到那儿去滑，那儿的冰又平又好。”小男孩掉进冰窟窿死了，而那个少年又滑了个把小时才回到城里，他向同学们讲述他怎样使那个小男孩上了当。死去的小男孩的父母悲痛万分，他们问这个少年：“你是知道把小孩引到什么地方去的，难道你的心竟没有颤动一下吗？”少年平静地回答说：“我又没有把他推到冰窟窿里去。他自己滑到那儿去的。我只是劝他到那儿去滑冰——那儿的冰层平滑……”——“那你为什么不马上跑来告诉我们？可能小孩还有救……”对这一点，少年回答说：“我可用不着跑回来，关我什么事。每个人都对自己负责……”

我和这个少年谈过话，和他的父母、教师、少先队辅导员谈过话。我看到的是一幅令人不快的景象。父母和他们的独生儿子都没有任何精神上的爱好。这孩子只有两种感情：满足或是不满足。家庭里高于一切的是两种需要：吃好、睡足。这个少年不理解一个人多么需要在与别人的交往中得到欢乐，不懂得为别人做好事、创造幸福的欢乐。而学校里只

要这个男孩子学习成绩不是 2 分，只要他不破坏纪律也就满足了。我问一位女教导员，她在这个少年身上已经培养起或者准备培养他什么样的精神需要时，她什么话也答不上来。对于这个人在童年期和少年期把全部精力贯注到什么地方，耗费在哪个方面这样一个问题，我没有听到过任何回答。实质上，学校没有考虑在一些最主要、最根本的问题上教育人。

一切都取决于童年期的教育

我对少年期教育中的困难分析得越多，就越是对这样一条简单而重要的规律的正确性深信不疑：凡是童年期教育搞得很马虎的地方，也就很难对少年们进行教育。我研究了 460 个出了违法少年和犯罪少年的家庭，发现这样的情况：罪行越重，犯罪手段越是惨无人道、残忍无情、动作笨拙的，犯罪者的家庭也是最缺乏智力上、美学上和道德上的追求。在犯罪少年或违法少年的家庭中，没有一个家庭是有家庭藏书的，即使是少量的藏书也没有。我上面讲过的那个犯罪少年的家里，除了教科书之外，别的书一本也没有，而且那几本教科书也是又脏又烂。在这 460 个家庭里，我总共才找到 786 本书（学校的教科书不算在内），其中包括学龄前儿童读的小人书。在犯罪者或违法者中间，没有人能说出一部交响乐、歌剧乐曲或室内乐的名称。没有一个人能举出一位古典作曲家或现代作曲家的名字。我们给全部 460 个少年都听了两个音乐作品：彼·伊·柴可夫斯基的芭蕾舞《天鹅湖》中的《小天鹅舞》和爱·格

里格的《爱尔菲舞》。理解和感受这两个音乐作品的美，是少年具有起码的美学素养的标志。这些少年中，没有一个人能够说出，作曲家通过音乐形象创造了什么样的意境。我从少年们的眼睛中看出：音乐的旋律并没有使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激起某种感情，也没有勾起任何回忆。

在研究少年违法分子和犯罪分子的精神世界的时候，我对这样的问题也进行了探讨：这些少年有没有最亲近的人们（或人）？少年们可以把自己的一部分心灵献给这些人，把他们作为一面镜子，从中看到自己的内心冲动。我分析过，在难对付的少年（确切些说是童年期和少年期精神上贫乏的人们）学习的学校里，是否还存在这样的相互关系，这种相互关系的本质和内容是把精神力量贡献出来，一个人为别人创造幸福，为别人的命运担忧，用理智特别是用心灵来理解人的最大欢乐——把幸福送给别人。我发现，在这些少年的家庭里和学校里，都没有这种最主要的东西。教育工作中恰恰是没有这种明确的意图、明确的目的，没有教育每个人在童年期就要为别人尽力，把自己心灵的财富献给别人，用理智和心灵来理解（从而能深刻地感受，热忱地关怀）别人内心世界最细微的活动——痛苦、欢乐、担忧、绝望、悲伤、慌乱……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越来越确信，在童年期一个人（受教育者）在很多教育者面前，甚至是优秀的教育者面前，总是表现得非常片面，因为教育者总是只根据儿童是否遵守制度和要求来判断受教育者的好坏：是否听话，是否

爱德华·格里格（1843～1907）：挪威大作曲家，民族音乐学派创始人。——译者

有越轨行为。很多教育者把儿童的听话和顺从看做是内心善良的表现，实际上远非如此。到了少年期一个人就不能满足于如此贫乏地表现自己：他渴望在复杂的公民活动和积极的社会活动中表现自己。由于没有教会他把自己的精神力量献给别人，由于他没有学会自我理解、自我感觉和自我评价，没有学会如何献出自己的力量为别人造福，到了少年期他似乎就不再觉察到自己是生活在人们中间的。

读者可能会想：为什么作者要研究未成年人的违法分子和犯罪分子的精神生活？这对阐明少年期教育的本质和规律性有什么帮助？事实是，违法和犯罪行为能最鲜明地反映因果关系。我的夙愿始终是不再使任何一个少年成为违法分子和犯罪分子。

有人说，由于少年期具有某些天生的、不受教育支配的年龄特征，在少年身上所特有的种种困难是注定要发生的，现在这种无稽之谈的实质就越来越清楚了。我日益深信，少年的道德面貌取决于童年期怎样对他进行教育，取决于从出生到 10~11 岁期间在他心灵里灌输了一些什么东西。从本质上来说，童年期不可能给家长和教师带来少年期所遇到的那种困难。少年，形象地说，那是一朵花，它的美丽与否要看人们对这株植物养护得如何。应当早在花朵怒放之前就要设法使这朵花开得美丽。如果在少年期的那种“不可避免的”、“注定要发生的”现象面前惊慌失措、惊奇万分，那就像一个园丁那样，这个园丁在地里种了一颗种子，但他并不确切知道，这是一颗什么种子，是

玫瑰还是飞廉^①，几年之后他来欣赏花朵时就表现出这种惊奇万分的神情。如果开的不是玫瑰花而是飞廉花，园丁的惊奇就显得十分可笑。如果人们看到这个园丁还给飞廉花涂颜色、画彩条，想使飞廉花变成玫瑰花，如果他给飞廉花浇香水，想让飞廉花发出玫瑰花的香味，那么他的这种做法就更显得幼稚可笑了。看来这样的园丁只会引起人们的愤慨。可是，有成千上万这样的园丁，他们给人以生命之后就认为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至于这个人将成为怎么样的人，就让别人去关心吧，让大自然去关心吧，——为什么这样的情况竟没有引起人们的愤慨呢？

花朵的美丽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需要多年的努力才能创造出来——培育，防酷暑、严寒，注意浇水和施肥。在塑造大地上最美、最崇高的东西——人的过程中，单调的、使人疲劳不堪而且往往是令人不快的劳动，要比那种给人们带来愉快的劳动多得无可比拟。“孩子是生活中的欢乐”这条真理具有深刻的含义，但也有深刻的矛盾。孩子本身不可能是欢乐的源泉；孩子——这是一个在新的基础上再现其父母品质的人，对父母亲来说，从孩子身上得到欢乐的真正源泉首先是他们能够把好的品质灌注到孩子身上。在对孩子的爱中展现出人最高尚的品质——自尊心。

随着我对少年期令人担忧的种种表现的日益关切，我越来越清楚地感到，童年期的教育不能草率从事，不能怕麻烦。童年期是一个人打基础的时期。大自然不会去雕琢人的

飞廉：植物名，菊科。二年生草本，形似蓟。我国各地均有野生，俄罗斯西伯利亚一带也有分布。——译者

任何一个特点，它只会打下一个烙印；应该去做雕琢工作的是我们——父母、教师、社会。少年期的危机现象——道德缺陷、违法、犯罪——所有这一切现象，如果用列夫·托尔斯泰的话来说，是恶行的放大镜。一些我们难以觉察的坏事，一些初看起来似乎是天真的、微小的坏事，实际上却是很危险的，因为在一个睁大了眼睛看世界却又不知道应该如何生活的人的心灵中，这些微小的冰凌会变成巨大的冰块。

当我准备在自己这所蓝天下的学校里、在低年级的教室里对孩子们进行教育的时候，我总是怀着不安的心情思考着我的学生们快要到达的那条标志着童年期结束、少年期开始的分界线的情况。假如一个人一辈子是儿童的话，那么在我的学生们处于童年期时我力图要去完成的工作中，有很多工作是不需要做的。鉴于同事们和我本人的痛苦经验，鉴于所犯的大量错误，我深信，学校教育工作中最大的问题之一是忘记了这一点：现在是儿童，将来就不是儿童了。

教育者必须注意的是孩子到了某个时候会成为丈夫或妻子，将通过一个新的人来再现自己。我注意到了这一点，虽然很少在儿童们面前说，他们将成为父亲和母亲。仔细读过我的第一本札记的人，就不会不注意到，我们对童年期的孩子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以便在儿童身上形成感知周围世界的细腻感情和情感素养——能识别人、有感受能力、情感敏锐、亲切诚恳，同时还具有自尊心和人的自

豪感，不去侵犯任何私人的和隐秘的事情。为了使儿童处于集体的许多劳动关系、道德关系、智力关系、美学关系之中，我们也进行了不少工作。这样做的目的不仅是为了今天，也是为了将来。

儿童是决不可能成为犯罪分子的，决不会有意识地去犯罪（对病态的情况需要进行专门研究），但我尽力做更多的工作，务必使我的每一个学生成为少年之后，也决不允许自己去犯罪。在教育工作中有很多专门建立的、人为确定的、“构筑起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目的是要在学生们的心灵中确立起像对待最珍贵的宝贝那样来尊重人，使一个人从小就成为别人的朋友、同志和兄弟。

第一，儿童为别人创造欢乐，并由此而感受到自己的幸福和自豪。我努力使每个儿童都从心底里感到，最值得欢乐、最珍贵、最神圣的是母亲、父亲、兄弟姐妹和朋友。要让儿童准备为自己最亲爱的人的幸福和欢乐献出一切，要使这种献身精神和为别人造就幸福的精神成为最主要的精神需求。我竭力想使儿童与他家里和学校里的其他人之间的关系建立在义务感和责任感的基础上。使儿童意识到并感受到自己对母亲、父亲、教师应尽的职责——正是这一点应该成为儿童认识人的世界的起点。

第二，在表现美的各个方面创造并保持美。一个人进行积极活动的精力和可能性越大，他对美的态度在形成其道德面貌方面所起的作用也就越加显得重要，这里包括创造美，热忱地关心美，特别是关心人们相互关系中的美、为崇高理想而服务的美、思想生活中的美。

第三，儿童在集体活动中所表现的作为公民的思想财富

和儿童们与其他非学校集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中所表现的作为公民的思想财富。务必使学生在童年期就十分关心祖国的现在和未来——这是防止少年期产生道德缺陷最重要的前提之一。公民的思想、公民的感情、公民的忧虑、公民的义务、公民的责任感——这是人的尊严的基础。如果您在某个人身上培养了这些品质，那他就不会表现出不好的品质，相反，他将努力只在好的方面表现自己，以无愧于我们的思想，无愧于我们的社会。

第四，培养和发展对一切有生命的和美的东西的同情心和怜悯心（我们不必害怕怜悯这个词和它所包含的高尚感情！），发展对大自然中的一切美好事物的热忱的关切态度。归根结底，也就是培养对人的怜悯心。我们牢记高尔基的话：“怜悯损害人的尊严。”¹但是，在我们这个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理由出现社会祸害和与之相联系的痛苦和灾难的社会里，怜悯是需要的，它恰恰能使人品德高尚，在道德上支持人。只有那种瞧不起人的怜悯才损害人的尊严。而当一个学生出于怜悯而渴望帮助别人的时候，这样的怜悯会使他变得高尚，所以必须学会怜悯人。

第五，发展崇高的智力素养——思想、感情、感受。当一个人认识周围世界，认识人类的过去和现在，认识祖国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认识本国人民的内心世界、艺术珍品特别是文艺作品的时候，思想、感情、感受会使他内心激动。我坚信，一些人在少年期和青年早期之所以头脑简单、情感贫乏、道德不坚定，其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知识有限、思想修养低、不会从书籍中寻找满足自己精神需要的东西。现在，我们即将实现普及中等教育，工人和农民接受中等教

育并不是为了上大学，而是为了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因此他们的智力素养问题，使他们具有高度的智力素养的问题已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吸引青年人的不应该是酒杯而是书籍。书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它能战胜酒杯的罪恶力量，而酒杯是巨大的灾难，它像虱子一样总是叮在精神空虚和兴趣贫乏的人身上。

儿童将来就不是儿童了，他变成少年、男青年、女青年、父亲、母亲……但是，如果在少年期和青年早期一个人的心灵中仍然保持着儿童的某些特点——直爽，对周围世界的各种事件和现象有鲜明的情感反应，对一起工作、学习、患难与共的人们的内心精神活动表现出热忱的关切——那样就很好。

我以后还将多次提到这个最重要的教育问题，现在我只着重指出这个问题的一个方面，即与保持和发展童年期所获得的一切美好的东西有关的那个方面。我要谈的是儿童精神世界的细腻性和复杂性。细腻不是天生的，只有通过培养才能够获得。我在第一本札记中用了大量篇幅论述如何培养细腻的感觉：感觉语言的美、音乐旋律的美、文艺形象的美，感觉各种生活现象的崇高和优美，或者造型艺术作品中和文艺作品中思想的崇高和优美。家长和教师们的议论使我很不安，他们说，少年期必然会感觉迟钝，必然会出现某种莫名其妙的情感“冷漠”；少年从树上折了一根树枝，立即就会把这件事忘了；他会同样冷漠无情地用弹弓瞄准玻璃和麻雀，在课桌椅上刻上自己的姓名和整句的格言。我于是仔细观察犯这类过失的少年。结果发现，他们在童年期虽然都参加过集体的星期日植树义务劳动，但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把

树栽培大，没有一个人感受过创造美的欢乐。

生活向我们证明：如果一个儿童对充满了为人们创造出美这一崇高思想的劳动不理解，那么他的内心就不能用细腻、体贴和容易感受的态度去对待那种细致而又“温柔的”教育方法，他变得迟钝，只能领悟原始的“教育方式”：大声呵叱、强制、惩罚。由此而形成了少年们的粗鲁无礼和无意识的破坏性倾向。正因为如此，我要努力使我的未来少年们，在童年期就能体验到美的激励和对美的赞赏，使他们的个人劳动成为产生这种感情的源泉。这就是关心培养（后来我深信我的期望是有充分根据的）少年、男青年、女青年敏锐地、反映迅速地去对待教育者的话——他的劝告和婉转的责备。童年期感情细腻而又丰富，赞赏自己亲手创造的美，对粗鲁、庸俗、破坏美的行为毫不妥协，这就是少年们情感素养的基础。

我特别关心的是，务必使儿童的心灵不致由于使用体罚的“教育”方法——用皮带抽、打后脑勺、拳打脚踢——而变得迟钝、凶狠，变得冷若冰霜和残酷无情。我总是要使家长们相信，体罚不仅标志着家长的软弱无能和惊慌失措，也标志着他们的教育方法极端不文明。皮带和拳头会在儿童的心灵中扼杀细腻敏锐的感情，培植愚昧的本能，起着腐蚀人的作用，最后就是用撒谎和奉承这个毒药来麻醉人。用皮带培养出来的儿童会变成麻木不仁、没有心肝的人。动手打同学的人，只能是那些过去尝到过而现在继续在尝宗法式教育的“美味”的人。少年的犯罪行为和违法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拳头教育”的结果。

教育中的皮带和拳头……这是我们教育工作者的耻辱，